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青年成长基金项目文库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

丛新强◎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青年成长基金项目文库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

丛新强◎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丛新强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 4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文库)

ISBN 978-7-5329-2994-8

I. 基… II. 丛… III. 基督教—宗教文化—关系—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7011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潍坊彩源国标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千字/221

定 价 23.00 元

.....

序

.....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宗教和文学艺术密不可分。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二者在历史渊源、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宗教文化历来就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资源。马克思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曾计划写几部书,“其中有一部关于宗教和艺术的稿子,似乎已经写得相当可观”。^①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艺的重要精神支柱,不了解基督教文化,恐怕难以理解和接受西方文艺的精髓。在东方,由于儒、释、道文化占据主流和强势地位,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历经坎坷。基督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学术界众说纷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丁光训先生认为,基督教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被称作“洋教”。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下,基督教步入革新之路,渐备中国特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人士第一批1500多人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俗称三自爱国运动,以达到革新中国基督教的目标”。^②

① [英]希·萨·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4页。

② 丁光训:《我们应该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载2001年7月28日《人民政协报》。

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不乏基督教文化元素。欧美文学与俄罗斯文学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作家。有的受洗为基督徒,有的曾在教会学习,有的迷恋于《圣经》文本。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联系一度受阻。历史进入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基督教文化的复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基督教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也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如何,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存在状态与价值建构具有什么学理意义乃至实践有效性,便是丛新强君这部著作要考察与探讨的问题。

全书分为四章,着重梳理和探研基督教文化在当代中国大陆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和台湾文学中的种种表现及其特征,论证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具有何种关联。在广阔而深远的中西文化背景下,新强君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纵横捭阖,探幽烛微,条分缕析,论从史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呈现多元发展趋势,基督教文化能否作为一种文学资源和建构支撑呢?该书所给予的答案并非云蒸雾罩、似是而非、朦胧不清的,而是有理有据、逻辑严密、肯定无疑的:基督教文化不仅是一种“罪感”文化,而且也是一种“爱感”文化,其“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利于博爱现实主义的建构与发展;基督教文化是一种“普世”文化,有利于消解中西文化对峙,促进文化融合,加快文学从现代性走向世界性的步伐;基督教文化并非“审判”文化,而是“赦罪”文化,其“宽恕”、“宽容”精神有利于和善的、建设性文学批评的倡行,有利于和谐的文学创作氛围的营造和多样性文学批评视角的拓展。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该论著所具有的学术前沿性、探索性、学术价值和积极意义,读者自有公论,无需我多费口舌。

接读新强君送来的书稿清样,十分高兴。祝贺之余,希望他继续努力,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一片新天地。

牛运清

2008年12月

.....

目 录

.....

序	01
---------	----

引言	01
----------	----

第 1 章

中国当代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背景	09
----------------------	----

第一节 基督教发展脉络	11
-------------------	----

第二节 基督教在 1949 前的中国	18
--------------------------	----

第三节 1949 后的基督教文化处境	27
--------------------------	----

第四节 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文化	35
--------------------------	----

第 2 章

中国大陆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言说	43
----------------------	----

第一节 穆旦:文化转换中的神性话语	44
-------------------------	----

第二节 礼平:对神性的理性认知	68
-----------------------	----

第三节	史铁生：对神性的感性依赖	71
第四节	海子：对神性的自觉性召唤	93
第五节	北村：对神性的信仰性皈依	107
第六节	其他：精神暗合或表象借鉴	125

第 3 章

中国台湾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言说	133
第一节 蓉子：信与爱的情感追求	134
第二节 张晓风：诗性与神性的对话	151
第三节 陈映真：“上帝之子”的抉择	174
第四节 白先勇：悲世悯人的情怀	203
第五节 王鼎钧：历尽梦幻探永恒	226
第六节 其他：“经院哲学”的影响	249

第 4 章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	255
第一节 博爱现实主义之建构	257
第二节 中西融合之建构	264
第三节 后现代建设性向度之建构	268
第四节 宽容原则之建构	273

结语	282
----------	-----

主要参考文献	285
--------------	-----

后记	293
----------	-----

.....
引 言
.....

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价值选择问题异常醒目。考察当代中国文学的诸类形态及其多种潮流，不管形成了怎样的眩人耳目，不难发现，无论在创作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其发展结果与实际效应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价值困境及其方向性迷茫。我们时常感叹，中国文学怎么了？创作上难见上乘之品，研究与批评又多见浮躁之气……就是日常性说明。可以看出，价值形态已经难以左右文学局面。传统的，西方的；母体的，形式的；革命的，批判的；经验的，体验的；阐释的，命名的……都在做出拯救文学的姿态，但又都无法不逼近被拯救的结果。还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在发展进程中同步产生了怎样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恰恰阻碍了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影响到中国文学的持续以及未来的生命力。继而，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并且凭借怎样的一种价值尺度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找到一种可资借鉴并行之有效的方向性维度，这便是需要直面对待并严肃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一切问题又都源自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并不新鲜又似乎陈旧幼稚但却必须直面并且再也不能继续回避的问题：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她又能实实在在地干得了什

么？如果什么都不能干的话，干脆不要算了。归根到底，文学是“有用”的。她的用处就在于——抚慰心灵，增进信赖，给人希望，让人感动，让人爱，进而，在没有爱的地方活出爱，从而，日益完善人类生存。这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真正存在价值和根本，至于其他的，枝节罢了。综观当代中国文学，形形色色的表现形态以及表面上的多元化都非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质在于“爱”，在于教人去“爱”。反过来问，要靠文学进行“革命”吗？要靠文学进行“批判”吗？还是要让文学去完成其他任务？况且，她又完成得了吗？正面与反面的事实已经做出了令人警醒的回答。若此，文学只能“异化”。因此，一种“博爱现实主义”的文学样态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选择就尤为值得倡导。当然，这里所指的绝非汉语言文化语境意义上的狭隘的“爱”，而是一种源自基督教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博爱”。按照《圣经》的表述，“爱是无可比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①

至此，“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论题得以引出。于是，全面梳理、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便历史地、理所当然地成为本书的任务。应当说，论题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绝非一时性起而随“宗教热”潮流、赶“宗教热”时髦。同时，除了源自思想性和理论性的学

① 《新约·哥林多前书》13：1—8，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6 年，南京。

术兴趣外,还包涵有个体自身的生存性焦虑与存在性关切。

话说回来,宗教和文学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在历史渊源、思维方式、关注对象、精神作用等方面又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由于各自的特性和关系,它们互为影响。德国神学家库舍尔在为他所编的《神学与文学》一书所写的“几点说明”中谈到:“它们要打开对宗教感兴趣者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在文学领域实际上可以发现一块独创性的语言练习、创造性的想象和勇于反省的绿洲。这片绿洲将为那些古老的宗教问题注入新的时代活力。对那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们,它们则可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肯定的、还是有争议的宗教——都一再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①甚至可以说,离开了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考察,就难以对文学的某些根本性问题做出研究,甚至无力把握文学的本质而常常浮光掠影或言不及意甚至南辕北辙。

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基督教文化是其精神支柱^②,不了解基督教文化,就无以解读西方文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于以儒家为支柱的传

① [德]汉斯·昆伯尔等:《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第5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

② 余英时先生论述中西文化比较的一段话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西方自宗教革命与科学革命以来,上帝和理性这两个最高的价值观念都通过新的理解而发展出新的方向,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人世的勤奋创业理解为上帝的召唤,曾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把学术工作理解为基督教的天职也促进了西方近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和法则。这是近代许多大科学家所接受的一条基本信念,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如此。爱因斯坦把上帝理解为理性在自然界的体现,因此他终生拒绝接受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原则。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第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加上佛教文化的强大势力与影响,以及中国庙堂及民众自身的天然素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经坎坷。及至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不平等条约所签订的传教条款,遂使得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深入。然而,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具有了真正全面的交流与互动是发生在20世纪。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而且出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大大开拓、加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向度。这一领域,除了一批重要论文外,还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比如,朱维之先生初版于40年代(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5月)、1992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的《基督教与文学》;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由路易斯·罗宾逊著、傅光明和梁刚译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马佳著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杨剑龙著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王列耀著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王本朝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的王列耀著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中许正林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等等。

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密切关系,已经是不存在怀疑并得到深入研究的问题。相对于此,中国当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究竟有没有值得考察与研究的关系,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一领域的研究则显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就是一种忽视状态。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全面、系统、有意识的综合研究。有鉴于此,本书力图全面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以期弥补这一

欠缺。从而,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广度,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度。

基于上述考虑,中国当代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中国当代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言说,而且,面对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与存在问题,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存在状态与价值建构具有何种学理意义乃至实践有效性,便成为本书考察与探讨的问题,也即是开拓同时又是创新之所在。进而,基督教文化能否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与精神资源之一种,或许应是论题带来的启示和思考。应当说,这一研究具有总结过去、面对现在、展望未来的意义。而目的,则是深切盼望当代中国文学能够出现具有真正人类终极关怀的伟大文本与不朽之作。这也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本书立足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作一历史的描述,同时探讨其对当代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价值建构意义。在此,论题不是把基督教单纯作为一种宗教来研究和批判的,而是把它当做一种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来对待。这样,就绝没有推崇和美化基督教的意思。反过来讲,即使是从批判宗教迷信和宗教唯心主义的角度看,也只有从各个不同侧面认识基督教,才能认清它的本质,达到批判的目的。众所周知,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用宗教观点认识世界的。基督教也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它是现实的反映。而作为一种宗教意识,这种反映中必然有迷信、谬误、偏见,但却总包含着一定的、哪怕是片断的积极的认识成果。恩格斯曾指出:“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①

^①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63。

认识世界,是在不断的表面和片面甚至谬误中向真理前进的。当然,在研究基督教时,绝对不可忽略它被“利用”的一面,特别是统治阶级利用它来达到政治、思想统治的目的,甚至把它作为军事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工具。这是不可否认的、很重要的方面,但本书论述的不是这一方面。^①

可以说,本书是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一个“描述”。也就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对有关历史事实加以记叙说明。不言而喻,事实是科学研究的立足点,实事求是它的基本原则。有的论者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尤其是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诸问题上时常下草率、简单的论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略历史事实。只有真正弄清历史真实情况,科学研究才能开始。文化史与文学史研究同样如此。当然,本书在“描述”过程间也提出了问题和观点,虽然可能是很不成熟的。

引进外来文化作为参照,方可能发现自身文化中的盲点与偏见。本书立足比较文化视野,运用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并且,在

① 时至今日,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务必分开。用林语堂在20世纪20年代“非宗教运动”中所持的二分法来说,“耶教”是“思想”和信仰上的问题,西方“战舰”则是“政治”和历史问题,反对可以,但不可盲目“排外”,危险是“把思想问题及政治问题搅在一团,是容易把反抗列强的政治问题变成反对一切舶来的思想,中了国粹家的遗毒”。而“思想上的排外,无论如何是不足为训的”,“但个人意见还是以政治上只管持国家主义,而思想上及一切美术文学上,要固陋自封,走进牛角里的人将来结果也只是沉沦下去”。(林语堂:《翦拂集·谈文化侵略》,《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第107~10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这样的见解仍有不过时的现实意义。即使像“宗教裁判所”这样的问题,也应具有明确意识:教会的确有错误,但这错误却是恰恰违反了《圣经》爱人如己、政教分离的原则所致。不能把人类的权欲、野心所犯的罪孽全算在上帝头上。还可参考:彭小瑜《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罚》,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4、5期。

这一研究过程中,力图做到历史描述与逻辑建构相结合,从而尽可能地避免由于比较而带来的凌空蹈虚甚至错位研究。即便如此,这一论题的局限性和可能出现的“陷阱”也很难避免。比如,在作比较论述时,由于相关材料将会得到凸现使用,而不相关材料则退居幕后甚或干脆弃置不顾,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夸大的印象。再比如,本课题明显属于文学研究中外部的文化——跨文化研究,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忽视甚至可能代替内部的审美研究的表层印象。而实际上,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二者都是文学研究的维度,没有高下之分,具有互补性而不是对立性,不能以重视或缺少其中一维而来责难另一维。因此,论题始终贯彻如下思想:“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仅仅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维度、一个特定角度、一个侧面,它绝不否认亦不能代替其他的研究向度,并且也绝不是主流性质的。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时代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文学才是主旋律。其他文学样态只是文学百花园中的一元,是不否定主旋律也否定不了的。而且,纯粹的文学研究绝对应该是对文学的艺术问题进行研究,这当是文学研究中更为主要的方面。不过在这里,这些都暂时没有成为本课题的关注重点。

近年来的文学研究,方法迭出、理论各异。比如,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接受美学、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虽然其中有价值的方面应该借鉴和吸收,但比较起来,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那么科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对基督教文化都很了解,而且深知《圣经》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将《圣经》作为文学宝库,将其中故事、寓言加以引用,并运用得得心应手。有学者统计,39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只拿人物来说,曾经引用过80多个圣经中的人物,共300多次,而历代教会历史中的人物、事件还不算在

内。39卷中共引用“基督”63次、“保罗”12次、“参孙”6次、“但以理”6次、“彼拉多”5次、“大卫”3次……对于历代教会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如：阿德里安教皇、基多、马丁·路德等又曾引用过许多次，其中马丁·路德就引用过60次。这些简单的数字和情况就足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基督教以及《圣经》是很熟悉的。^①并且，恩格斯还用大量篇幅论述过“原始基督教”和“启示录”。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向性的指导。同样，在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亦提供了正确的指针和有效的武器。本课题即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主导，辅之以其他比较研究方法时则取决于论题展开的需要。

在此不妨再听听伟大导师恩格斯发出的诗意盎然的声音：

到教堂外面上帝祈祷吧，因为他的大厦不是凡人的双手建造的，他的气息渗透了全世界，他要人们顶礼膜拜的是他的精神和真理。^②

我们是在神的怀抱中生活着，行动着，存在着！^③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宗教的追求与文学的目的，两者在终极价值方面异曲同工。对宗教文化和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显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仅是这一大课题中的一个微小部分而已。

① 杨周怀：《基督教音乐》第6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② 恩格斯：《齐格弗里特的故乡》，郑天星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第79页，华文出版社，1991。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82。

③ 恩格斯：《风景》，郑天星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第69页，华文出版社1991。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82。

第 1 章

中国当代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背景

1949 年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中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纪年。

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这一历史性转折,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同时,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自然,这一现实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文学也需要调整,以适应新的规范、期待和追求。无疑,时代的转换赋予文学以不同于此前的性质、使命和特征。基于此,以 1949 年为标志,文学的社会学研究者把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界定为“现代”和“当代”两个不同阶段。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提法,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后期。当时,为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是提出这一概念的最主要的动机。70 年代末,它已经得到广泛运用。而 80 年代以来,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处理这一概念上出现分歧。他们对这一名称的“科学性”提出怀疑,也质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分法,强调在对“20 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寻求另外的概念和分期方法。继续使用“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则已赋予它各不相同的含